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以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基点

● 杜 漪 / 著

光明日报 出版社

绵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以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基点

杜 漪 / 著

光明日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经济学研究/杜漪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206-444-7

I. 构… II. 杜… III. 城市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IV.F299.27 F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5979 号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著 者: 杜 漪

责任编辑: 田 军

封面设计: 刘 海

版式设计: 杜 娟

责任校对: 孙红英

责任印制: 吴明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印 刷: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装 订: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444-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源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2002年初，正是“三农”问题得到理论界和政府广泛关注的时候，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学与研究的老师，我当时对“三农”问题的直观判断是，“三农”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如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就成为我当时研究的重点。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我得出了如下基本判断：要实现农民增收，必须突破现行增收措施的局限，将重点转移到农民非农化上，农民非农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①。随着这一研究思路，如何实现农民非农化又成为我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农民非农化说到底就是要减少农民，而要减少农民就需要实现农民从农业向其他非农产业的转移——就地转移或异地转移。

通过对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对比分析，我发现异地转移（向外省转移）是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

^① 参见杜漪：农民非农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载于《理论学习》2003（12）。

的主要渠道，而这些年异地转移已受到越来越多条件的限制（诸如转移成本攀升、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等），因此西部地区必须开拓就地转移（省内转移）的新渠道。鉴于西部地区乡镇经济的天生发展不足以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滑坡，我提出了“民营经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的主张^①。当然，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或异地转移，是一种通过“外化”的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即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各级城市，依靠城市及其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仅仅依靠这种“外化”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既依靠“外化”的力量又重视“内化”的作用，将“内化”与“外化”有机结合起来，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循着这一思路，我又将“城乡一体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②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一体化关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随着对这一课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因此消除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体制障碍，实现城乡社会体制一体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首要条件。作为这一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又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③。该项课题的研究力图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探寻城乡对立的制度根源，进而通过城乡制度变迁打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突破口。

四年来，我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循着以下思路逐渐深入和清晰

^① 参见杜漪：民营经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J】载于《西北大学学报》2005（03）。

^② 该课题为绵阳师范学院2004年度重点立项课题（MB2004019）。

^③ 该课题是四川省教育厅2005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川教科 SA05-091）。

起来：农民非农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非农化必须将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有机结合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城乡一体化有机结合起来——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些研究一方面使我对三农问题解决途径逐渐明朗化，即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建立在城乡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如何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城乡统筹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吗？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正是城乡统筹战略，只是当时的城乡统筹是一切服从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这种统筹的结果却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可见，城乡统筹并不必然带来城乡协调和良性互动，这取决于统筹的目标；我们今天强调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目标是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只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手段。因此，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模式的转变、城乡发展战略目标的重新确立，这才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关键。

鉴于此，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取决于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重新确立及其实现。实际上，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战略决策的不断深化也正反映了这一点：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它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十六届四中全会纳入执政能力建设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新时期战略目标的确立，同时为我国新时期城乡发展战略目标的确立提供了依据，这就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从我国目前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差距巨大的现实来看，构建和谐城乡关系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至关

重要的环节。

怎样构建和谐城乡关系？这是我们在新时期需要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和谐城乡关系的构建则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空间和生态等等，这更需要一个较好的理论视角，能将城乡和谐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中。本书选取了“公平与效率统一”这一理论基点，这主要是因为：城乡关系的本质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谐城乡关系最终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利益和谐（均衡）；城乡之间利益和谐取决于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均衡），最终表现为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研究意义

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了：整个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不断地集中于一些有限的地区，这些地区被称为“城市”，成为沟通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在人类学家看来，形成城市中心是人类文明区别于前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从有了城市，整个人类的活动区域就被分割为城市和乡村，城乡之间的关系历经千百年的变迁，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主题。城市化是专业化分工和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城乡之间的对立运动则成为工业文明的主旋律。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①早在19世纪后半叶，城乡之间的对立与不协调及其带来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就引起了许多西方国家学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并希望找到解决的良策。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由斯旺·索南沙因出版社出版（即阿蒂克出版社1985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0页。

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作者在序言中这样写到:“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这种该诅咒的社会和自然的畸形分隔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①并针对当时英国的大城市病弊端,提出了用逐步实现土地社区所有制、建设田园城市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逐步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即田园城市)。受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影响,今天,田园城市运动也发展成为世界性运动。这不仅反映出人们构建田园城市的美好愿望,而且反映了城乡对立关系向和谐城乡关系转变的大趋势。

我国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我国也正经历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和城乡失衡的不断加深,目前我国也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9年前者为后者的2.28倍,1997年为2.47倍,2002年扩大为3.11倍,2004年更扩大为3.21倍;加上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多享受的教育、文化服务和其他社会福利等,农村居民收入减去上交的各种税费,再加上农民的收入还要投入农业再生产而不能全部用于个人生活消费的现实,致使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据有关专家估计,差距已达5-6倍,这远远超出了世界平均1.5-2.0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年人均收入低于625元的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3000万,低于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有6000万,两者共占农村总人口的11%。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城乡差距巨

^①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9页。

大、城乡矛盾突出等城乡不和谐的现实，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城乡不和谐不仅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威胁，而且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关键。

实现城乡关系从分离向融合、从对立向和谐的转化，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呼唤加快和谐城乡关系的理论供给。因此，加强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和政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三、研究思路

构建和谐城乡关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基础和前提。本书将构建和谐城乡关系作为研究的主题，一方面是要明确“和谐城乡关系”的基本内涵，即什么样的城乡关系才是和谐的城乡关系；另一方面是要阐明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有效路径，即怎样促进城乡和谐发展。鉴于此，本书将从3个部分8章来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共3章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即基本理论分析及其扩展。

第1章是对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城乡关系的一个理论综述，该文献评述基本上以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为主线，从5个方面进行理论回顾和简单评述：早期西方学者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奠基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拓性研究；西方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传统和逻辑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发展；建国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城乡关系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本章关于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述评旨在：一方面，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必要归纳寻求为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有效理论；另一方面，要在总结前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第2章是在对国内外城乡关系理论评述的基础上,试图突破前人研究局限以实现理论上的创新,这就是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作为本书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点。这一理论基点的建立首先也是以前人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不同理论观点为切入点的,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学界不同的公平效率观的比较,从而确立了本书的公平效率观,即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均衡)。通过进一步对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内涵、统一的可能性、统一的必要性以及统一的路径的诠释,形成了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即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观。

第3章则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一个简单的城乡和谐的理论模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均衡)是城乡和谐的函数。本章在“人人都是平等的”和“泛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和谐”、“城乡”、“城乡关系”、“和谐城乡关系”以及“制度”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必要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城乡和谐的简单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公平、效率、制度与城乡和谐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四个层次上对这些内在联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一是揭示了城乡和谐是城乡公平与效率统一(均衡)的函数,因此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均衡);二是具体阐释了衡量城乡和谐的基本指标,揭示了城乡差距既是衡量城乡公平的基本指标,也是城乡和谐的最终表现;三是分析了影响城乡和谐的基本变量,指出影响城乡和谐的基本变量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即城乡和谐是各种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四是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阐释了城乡和谐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标准和构建途径,指出通过构建城乡和谐的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城乡社会冲突“负”功能向“正”功能转化,是实现城乡和谐的有效路径。

第二部分共2章是对第3章理论模型的经验验证,也是本书

的经验实证分析部分。

第4章从城乡关系变迁的国际比较角度来验证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状况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分别考察了欧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以及苏东转轨国家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公平与效率。从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角度审视各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可以发现，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对公平与效率各有侧重，一般是在效率优先、公平优先或者公平与效率并重之间进行选择。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在处理城乡关系时一般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效率优先”，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剥夺乡村、工业剥夺农业的城乡之间不平等关系；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一般是“公平与效率并重”，与之相对应的是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平等发展关系；而在工业化后期一般奉行“公平优先”，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和谐发展关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起步晚，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普遍推行了“赶超战略”；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一般都采用了各种城市偏向的不公平的城乡发展政策，即所谓“效率优先”；这种不公平的城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矛盾加剧，进而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苏东转轨国家在转轨前基本上选择了“公平优先”，其城乡关系的特点是高公平与低效率并存；转轨以来差不多以“效率优先”，城乡关系又多转变为低公平与低效率并存（少数中欧国家除外）。

第5章专门考察了我国自建国以来城乡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影响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改革前的1978年，是新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其城乡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工业对乡村农业的剥夺关系；1979年改革以来，是新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城乡之间的强弱势关系是这

一阶段城乡关系表现出的明显特征。直到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开始了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转变,城乡关系才开始表现出平等发展的趋势。城乡差距巨大是建国 50 多年来中国城乡关系失衡的突出表现,这种巨大的城乡差距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生产力等非制度因素,更主要的是源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城市偏向政策的作用。

第三部分共 3 章是对中国如何构建城乡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 6 章主要探讨了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目标模式。首先以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具体指标为分析基础,探讨了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需要达到的近期和中长期目标;其次,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三个角度探讨了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实现机制,指出,要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 7 章主要从经济、生态空间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阐明了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基础。城乡经济和谐、城乡生态空间和谐与城乡社会和谐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它们共同构成城乡和谐的基础。没有城乡经济的和谐,城乡生态空间和城乡社会和谐就失去了客观物质基础;没有城乡空间和生态的和谐,城乡经济和谐是不可持续的,城乡社会和谐也是无法实现的;城乡社会和谐是城乡经济和谐和城乡生态空间和谐的重要保障。因此,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必须使城乡经济和谐、城乡空间生态和谐与城乡社会和谐有机统一。

第 8 章在以上各章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路径,这也是本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将从三个方面阐明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具体路径:一是要以城乡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实现城市偏向制度向农村偏向制度的转变;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制度变迁的转折点,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国家战略从城市偏向向农村偏向转变;三是要以

农民工市民化为着力点，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为新农村建设创造条件。本章旨在阐明：城乡制度变迁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首要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犹如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两条腿，必须同步前行、共同推进，这既是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有效路径，也是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必须要完成的“三大战役”。

四、研究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分析范式，研究范式决定了研究方法，但对具体的经济或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从来就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往往取决于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城乡关系，一方面，城乡关系的内容包括城乡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空间关系、社会关系等等，因此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需要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哲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城乡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空间生态关系、社会关系等集中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城乡利益关系（利益均衡）的分析需要借助于制度分析方法、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在各种经济现象中，城乡经济关系具有更强的历史具体性，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城市，或两个完全相同的乡村，也从来没有过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重复，城乡经济关系研究决不能忽视这一点，必须密切注视世界各国的城乡关系史实为经济分析所提供的丰富资料。因此，如果说一般经济分析更注重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城乡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应注重逻辑归纳。城乡关系是随着产业分离、区域社会分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城乡之间的这种动态演变既是具体的，又必然遵循一定的历史演变逻辑，因此对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必须将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和逻辑归纳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

析结合起来，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具体说来，本书第一部分的基本理论分析遵循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对本书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术语进行必要界定、确定本书的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本书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因此该部分主要采取了逻辑归纳的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理论模型的经验验证，因此该部分对城乡关系变迁轨迹的考察遵循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和逻辑演绎分析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动态的历史演变中揭示城乡关系变迁及其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状况；而对各国城乡关系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主要采用经验实证的分析方法，注重运用具体的历史经验数据来阐明城乡差距变化规律、影响城乡差距变化的因素。

第三部分是在第一部分理论模型和第二部分经验实证基础上的对策研究，该部分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还运用了制度分析方法、博弈论分析方法、社会资本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

五、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研究选题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为了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并对我国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本书力求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城乡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更是处于转型时期国家确立或调整发展战略时无法回避而又棘手的现实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科，一般都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来研究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等等涉及城乡关系的问题，因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成为经济学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的经典模型。尽管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以及城乡二元结

构向城乡一元结构转换（即城乡对立向城乡融合转换）的有效路径，但却没能很好地回答如下问题：（1）城乡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2）城乡关系合理与否的标准是什么？（3）是否存在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有效路径？本书从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视角来研究城乡关系，用“和谐”来界定合理的城乡关系，并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作为衡量“和谐城乡关系”的标准，就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可见，本书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视角来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突破了以往理论研究视角的局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

二是理论上的创新。本书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作为研究的基点，在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公平效率观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公平与效率统一角度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一古老的经济学术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1）明确界定了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内涵，指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是公平与效率的一种动态均衡，即公平与效率的一种“最优”结合；（2）在经济学理论框架内阐明了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路径；（3）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同和谐城乡关系的构建有机联系起来，揭示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城乡和谐的函数；（4）有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知识，阐明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实现机制。

三是内容体系上的创新。在传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没有专门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城乡关系问题的论述基本上都是散见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科中，尽管经济史学家在揭示和考证城乡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化方面提供了许多史料和个例研究成果，但经济学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城乡经济关系纳入抽象化的经济学体系，至今尚未形成一门专门研究城乡经济关系的“城乡经济学”。

自然,笔者也无力在该书中实现这一“历史跨越”,但笔者还是尝试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1)什么是和谐城乡关系?(2)如何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全书将从三个部分8章对这两个主题进行理论诠释和实证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理论体系。

四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一方面,本书遵循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理论范式,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具体的历史分析与逻辑归纳有机统一,个案分析与系统分析有机结合,将传统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与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基本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本书还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公共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基本方法运用到城乡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在方法上突出了多学科“集团作战”的优势。

虽然本书力求在研究视角、理论基础、内容体系等方面都能做到完美无缺,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创新与缺陷又是并存的。本书可能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

其一,本书以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理论分析基点,以揭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城乡和谐的函数,能更好地将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纳入到城乡关系变迁的分析中。但由于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均衡)很难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加以准确量化,再加之笔者经济计量知识所限,本书没能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城乡和谐的函数用一系统的数学模型表述,只能被定义为一种动态均衡或者“较优”结合,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分析的效果。

其二,受本人运用数学工具能力的局限,本书的实证分析以经验实证和理论实证为主,没能用完整的数学模型加以表达,这

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和严谨性。

其三，由于城乡关系本身的复杂性，既包括经济问题也涉及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问题，这所有的问题难以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学框架内得以全面阐释；目前仍然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城乡关系的现成理论，本研究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也难免存在着诸多不足，还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总结和完善。